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

作者：杨天石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6-14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权。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夺取革命领导权，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曾团结合作，同蒋介石进行过几次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夺回了大部分党权和政权，但是，由于未曾触动蒋介石的军权，最终还是失败了。本文是对这几次斗争的一个历史概述。

一、迎汪复职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迎汪复职的口号最初是国民党左派提出来的。

1926年5月25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54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销假视事，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575~600页。】。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要求更为迫切。8月初，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精卫7月16日的信函，汪表示，辞去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销假以后，或在粤，或在别处为党服务”民何香凝主张借此请汪复职。8月10日，她在中常会第47次会上临时动议：【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5日。】现在请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主席。”【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635页。】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注：《吴玉章回忆录》第1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国民党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实现迎汪打算。9月，确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为此，顾孟余自愿联络北方左派，吴玉章亲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了两项宣传原则：1. 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2. 口号为“巩固左派与C. P 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但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利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

蒋介石对迎汪复职愈来愈疑惧不安。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汪精卫、胡汉民两同志，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紧销假，主持党务。”【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5册，第71页。】但实际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1926年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认为其目的在“倒蒋”【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0日。】。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徬徨歧路，莫决南针。”【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5日。】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日记说：“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5日。】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和进攻武昌受挫，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还不便强硬。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注：《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并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注：《蒋介石最近对于我们的要求》，《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9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官僚、驻防军及土豪劣绅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目前有三条路可走：1. 迎汪倒蒋；2. 汪蒋合作；3. 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走第一条路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走第三条路有很多困难；走第二条路比较适宜。【注：《中央致粤区的信——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1926年9月17日。】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使国民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人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解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1. 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 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3. 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注：《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由于蒋介石邀请吴廷康赴鄂。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注：《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Q1990Q32N11】。会后，吴廷康即与张国焘赴鄂。但二人赶到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首领【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9月9日。】。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注：】。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弟若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履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9日。】。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怎么会远涉重洋向汪精卫劝驾呢？

迎汪是为了抑蒋，但是，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直到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才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7人。从9月14日起至29日止，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

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它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左派的意图很清楚，即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理主席职务。对此，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作主席，声言“请汪复职”，“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5页。】。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0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左派决定退让，结果，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为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至28日召开，出席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注：《陈果夫回忆录》，见吴相湘著《陈果夫的一生》第105页，台北伟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1/4，左派占1/4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1/4。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内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注：《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1926年9月16日。】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第22页。】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之，持反对态度【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第55页。】。在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还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海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录》，油印件。】。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4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注：《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何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第3号。】。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5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注：《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第3号。】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注：《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各地民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傖、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认为叶、邵2人已有表示，未予议处；石瑛等8人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C P”【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C P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彼反革命之徒”。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处理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注：《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第12号。】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辩。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通过，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由于会议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张静江手中，因而，左派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并且只是书面上的胜利。

三、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注：《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第12号。】。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弄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05页。】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指徐谦——笔者）来”【注：Document44. Wibbur】。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作

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注：《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注：《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79—482页。】。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第59页。】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及文件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之策，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变为泡影【注：《革命军日报》，1926年12月1日。】。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注：《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1926年11月9日。】。次日，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注：《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12月4日。】直到次年1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临时联席会议【注：《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先辑》第115页。】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1927年初。】。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1. 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2. 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12月6日。】。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12月7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第58页。】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注：《民国十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12月20日。】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注：《复武汉各界团体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0日。】。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傖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董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注：《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使他不高兴。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1月24日。】气氛是欢快、明朗的，人们谁也没有料到，国民革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12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注：《各界欢送政府北迁盛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6日。】。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注：《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文稿《民国日报》1926年1月8日。】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13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5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必受影响”【注：陈公博：《苦笑录》（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第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7日，鲍罗廷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注：《鲍顾问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稿抄录》，1927年1月（上）。】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注：《临时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记录》。】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武汉方面仍坚持原议。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蒋的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予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的欢迎又是有原则的，目的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于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便出现了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 P，欺压C 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一封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

鲍罗廷昨晚宴会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民？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这样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他愈说愈激动，调子也愈来愈高：“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注：《陈友仁等为不宜变更中执会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1月15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注：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发言中，大家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注：《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记录》。】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浚、周佛海、叶楚伦等人，这些人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浚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注：《蒋总司令昨晚欢宴各界代表纪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1月18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后，致电徐谦，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1月21日、22日，蒋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按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注：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台北1981年6月30日出版。】【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17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9日。】。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2月5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蒋介石承受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大。

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派亲信、军需处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29日。】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日。】2月4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2月5日。】。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8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苏，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争告一段落以后。

经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2月9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谭延闿等三数日内即可莅鄂。但日期屡变，仍不见人影。20日，南昌各界召开开送党、政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21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1. 结束联席会议；2.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3. 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注：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四、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为了限制其权力，他们决定开展恢复党权运动。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注：《吴玉章回忆录》第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6月。】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注：《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26年2月10日，《蒋介石收电稿抄录》，另参见《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武汉文史资料》第4期第25页。】。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够领导一切实际工作。”【注：希伊：《时局进民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13日，湖北省、武昌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伊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将来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伤。”【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15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伦等30余人与会，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1. 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2. 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3. 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4. 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5. 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6. 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之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7. 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动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第73页。】。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注：《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们的普遍情绪。2月2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召开二届三中全会。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联即国家”的状况【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次日，武汉三镇15000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张静江”的口号【注：《武阳百夏党员大会庆

祝示威大会之热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大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2人，携带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和蒋介石商量，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两天后，他再次发表讲演，声称：“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他以没有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隐藏的杀机，预告了他要采取某些行动。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3日。】。28日，蒋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注：《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日。】。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蒋介石的意见，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交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注：谢宣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侧记》，《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46—48页。】。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注：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5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5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注：《蒋总司令欢送党政府迁鄂》，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注：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的一生》第107页。台北版。】

3月7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谭延闿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3页。】。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4页。】徐谦报告了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常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6页。】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余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8页。】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3页。】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与吴玉章针锋相对，会议气氛顿形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致使会议气氛更形紧张。为了圆场，会议采纳徐谦建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未敢动手【注：《陈铭枢告四军、十一军将士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6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兼补充革命学识”【注：《陈铭枢留别邓演达书》，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同日，邓演达、唐生智召集十一军官兵谈话，均表示“绝对服从党”【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47页。】

3月10日至17日，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6页。】。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党内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凌驾于全党之上。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56页。】。孙科称：“以主席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09页。】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4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页。】。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决议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16—317页。】。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其中7人为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事宜；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采纳彭泽民的意见，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注：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页。】

（三）坚持并重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

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斗争。”《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06页。】。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30页。】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由大会宣言，“令农民放胆去做”【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45页。】。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10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25%、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等【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28—330页。】。《对全国农民宣言》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08—311页。】。《农民问题决议案》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毛泽东9人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此外，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力，会议还批准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1926年12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15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339页。】。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右派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中央常务委员、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的权位则大大提高。

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1926年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从新右派手中夺回了党权和政权，其意义重大。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还在迁都之争初期，鲍罗廷曾对李宗仁说：“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他曾试图动员李宗仁取蒋自代，遭到拒绝【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4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3月下旬，武汉政府又曾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介石，再遭拒绝【注：参见拙作《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日本《东方学报》第59册。】。4月5日，武汉政府决定废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但是，已经没有实际效用。一周之后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章录入：djd 责任编辑：djd

- 上一篇文章：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方针的关系问题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